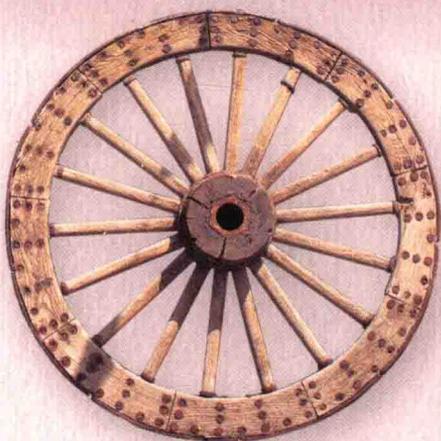


老舍的  
歲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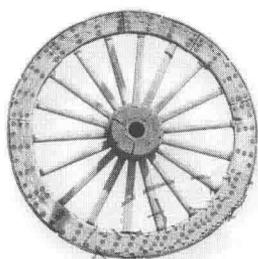
马  
纺◎著



河南人民出版社

马  
纺◎著

老  
去  
的  
岁  
月



河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远去的岁月/马纺著. —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15.4  
ISBN 978-7-215-09412-3

I.①远… II.①马… III.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66986 号

---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郑州市经五路 66 号 邮政编码:450002 电话:65788068)

新华书店经销 河南省瑞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

开本 70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 16

字数 172 千字

2015 年 5 月第 1 版

201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

定价:38.00 元

我看见许多书的前面都有个“序”“自序”或“前言”。在这本小册子将要完成之际也想在前面写几句。因为它只是个小册子,不是什么正儿八经的著作,搁不住用那郑重的词,所以就用了絮语,说白了就叫絮叨。人们常说:人要是上了岁数,说话就爱絮叨。现在就把这小册子的意愿以及它的内容,从头到尾絮叨絮叨。

说来话长,十多年前,有一次到老伴办公室去,正听见他和某出版社的一位编辑为出版《哲理沉思录》一书讨价还价。他为这本书撰写 60 万字,同时还一边像和尚化缘一样筹措出版经费。可文字完成了,钱却没凑够。只听他说:“钱就那么多了,文字可以减,撤掉几篇文章吧。”电话的那一头是编辑焦急的回话:“那怎么行,这是一本很好的书,我不同意撤掉文章。”公费出书是一种不正之风,他当然不会那样做,家里也积蓄无多,于是便

忍痛割爱“削足适履”了。他去世以后，我每每想起那天的情景心里就隐隐作痛。我想，他走了我还能为他做些什么呢？于是便萌生了把那撤下来的文稿为他再出一本书的想法。这就是《哲理沉思录》的姊妹篇《哲理求知录》，这本书是大象出版社出版的，精装本，很漂亮。学校领导说：可以作教学参考用书，也可用于全校教职员学习。要了几百本去，当然不是白要。我用学校给的书钱还清了《哲理求知录》出书欠款，余下的出版了《春风秋雨》。

说起《春风秋雨》又要絮叨了，那可是老伴的一块心病啊。那是2003年年末，他的病已经很重了，他好像已经感到自己来日无多。那天上午，他叫我扶他走到窗前，他依墙站着，眼望天花板惆怅地说：“有一件事我很后悔，许多年来我一直想我们俩合著一本书，唉！最终也未能如愿，以后恐怕就难了。”我想我不能让他后悔，不能叫他遗憾，这便是我编写《春风秋雨》的缘由。书中有他的诗歌、散文和文艺评论，也有我的散文和小说，共30余万字。拿到书之后我和孩子到陵园去给他送书。在墓前我告诉他：我俩合著的书出版了，是河南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你看看很漂亮的，愿你从此不再遗憾，你我的心愿实现了。这以后又写了《昨日的风昨日雨》。

又是很长时间无事可做了，整天没着没落的。这时孩子给我送来几本新书，其中一本叫作《最慢的是活着》，乍一看觉得书名挺古怪的，但仔细想来却不无道理。我老伴走了快10年了，而我还活着，活着不干事不是显得更慢吗？我也想到前些年要

不是有三本书牵着魂儿，还真不知道用什么办法打发日子呢。我想既然活着就要活得健康，活得从容，活得充实。自己能干的事就不依赖孩子，想干的事就随心所欲。有人说：人的一生什么经验都能有，就是没有老的经验。是啊，时光不能倒流，人生没有预演。

许多人都说：老年人爱说过去，年轻人爱谈未来。这是实话，老年人不说过去说什么？说未来？有吗？年轻人是“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而老年人已是“近黄昏”。所以就别说未来了，还是絮叨絮叨曾经拥有过的吧，那才是老年人的专利。我永远纪念过往的年月以及那些人、那些事。过去很忙，忙工作，忙家务，忙孩子。那个阶段的任务已经完成了。现在有的是时间，何不趁着这漫长的“黄昏”，趁着脑子还不糊涂，还能拿动笔，把它们来描画呢？于是又提起笔来每天写几十个字，心情好的时候，还能写上千字呢。日积月累就写了几篇小文，凑成一本小书，取名《远去的岁月》。几篇小文分别是：《焦书记的早餐》《办公室里的笑声》《“四清”工作队员》《小希希长大了》《老保姆的故事》以及《远去的岁月》和《我的三位房东大娘》、“乡村风情组歌”等。书中的人是我熟悉的，事是我亲历的。都是些实事，就算是“写实小说”吧，或者就叫生活记录也行。

我写《焦书记的早餐》的时候，就想党的干部如若都能像焦书记那样，我们的国家何愁不富强。那天我当着孩子们说：“听说现在公款吃喝一顿饭都花上千元，是真的吗？”孩子们说：“老太太你落后了，你那是老皇历，现在何止上千，上万元都不止

啊。”我听了很惊讶,也很焦心。早些年就流传着一个笑话,其实不应该把它当成笑话,那是群众对一些干部奢靡的生活作风不满的批评指责:“一支烟,半斤油。一顿饭,一条牛。屁股坐着半座楼。”这也使我联想起我看过的一本书,书名叫作《曾国藩成大事的九九个方略》,读后我随手摘记几段,不妨抄录在这里:书的前言里先说:毛泽东一生“独服曾文正”。书中说到曾国藩怎样吃饭,曾国藩每食只蔬菜一品。虽身为将相而自奉之啬,不异于寒素之家。因而有“一品宰相”之称。

他任两江总督时曾巡视扬州一带,扬州盐商以总督至特备盛宴,山珍海品罗列满桌,曾仅食面前所设数菜,稍食而已。退后谓人曰:

一食千金,吾不忍食,目不忍睹。

《办公室里的笑声》是写一处办公室一天上午突然来了一群高考落榜生,之后他们都回家务农,经受了风风雨雨,成了农村推广新技术、培育优良品种的骨干力量。他们每个人都有成串的故事。所以办公室里一会儿笑声朗朗,一会儿又泣涕涟涟,笑声背后有辛酸啊!

在《“四清”工作队员》中我着重写了“三同”,三同就是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别看只有七个字,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我们刚入村三天就碰上了一件事:房东大娘对我们刷牙就很不惯,她说:“见天清早用那小白棍儿在嘴里戳,咕嘟一嘴白沫子,看着叫人恶心。”怎么办?就找组长老李拿主意,组长说了一个字“躲”,躲开她的视线。现在你还改变不了她的生活习惯,因

为不现实,连肚子都吃不饱哪有闲钱买那小白棍儿?上级领导在同吃这个问题上更是三令五申,入村前规定不准吃肉,不准吃鸡蛋,入村以后又追加不许吃粉条吃豆腐。在同住的问题上也是很讲究的:规定必须住在贫下中农家里。工作队员老闫就三择其住户:本来给她安排的住户是贫农,没过一天,她看到房东大婶的右手无名指却戴着明晃晃的金戒指,不敢怠慢,立马向组长汇报,组长指示赶快搬家;又搬到一家也是贫农,拉家常时听说,这家大爷他舅的儿媳妇的娘家兄弟原是中学老师,1958年被划为右派,和右派沾亲带故还得了,别看是八竿子打不着的亲戚,那也不行,又一次搬家。搬来搬去倒像是“昔孟母择邻处”,孟母搬家是为儿子营造一个好的接受教育的环境,我们搬来搬去为什么?说白了就是一个“左”字在作怪。

《小希希长大了》中的小主人公希希,只是个艺术形象。我写作的时候是集许多孩子的优长于一身。我就是希望孩子们能够自信、自强、自立,“不因人热”。

我和老保姆相处三年,那正是国家三年自然灾害最困难的三年,粮食极度匮乏,我们一起度过。患难才能见真情啊。我俩无话不说,情同母女,我们之间讲的是:信任、平等、互相依存。我很怀念那个时代的老保姆。她们把伺候老人、病人、照护孩子这些事儿当成是自己至高无上的职业,兢兢业业地去做。有时候工作忙,或出差、或下乡蹲点,一去就是一年半载,你尽可以放心,她会为你在家撑起一片天。这就是我一直想写的“老保姆的故事”。

小时候,日本鬼子占了县城,跟着爸妈去逃亡,逃到了一个平静的乡村,一住就是六年,在那里度过了我的童年。我把那里当成自己的故乡,当成老家,当成是我的福地。那里是我终生难忘的地方。那就是《远去的岁月》中的故事。

《我的三位房东大娘》本来在《昨日的风昨日雨》书中已经发过。这次又经过修改拿来发表,并不是觉得自己写得怎么样,而是我太怀念三位老人了。书的最后又写了“乡村风情组歌”。

我写这小册子的时候心里还装着一个梦,我想在我80岁生日那天能看到这本小书出版。我把它作为自己给自己的生日小礼物。不知这梦能不能圆?同时也是对自己的身体和思维能力的一次考验。

2013年冬于郑州

CONTENTS

目录

001 \_\_\_\_\_ 絮语

001 \_\_\_\_\_ 焦书记的早餐

009 \_\_\_\_\_ 办公室里的笑声

023 \_\_\_\_\_ “四清”工作队员

048 \_\_\_\_\_ 小希希长大了

078 \_\_\_\_\_ 老保姆的故事

126 \_\_\_\_\_ 远去的岁月

163 \_\_\_\_\_ 我的三位房东大娘

207 \_\_\_\_\_ 乡村风情组歌

247 \_\_\_\_\_ 后记

## 焦书记的早餐

一篇《焦书记的早餐》我写了 50 年。那是 20 世纪 60 年代初，我还是《河南青年》杂志的记者，被派往兰考采访。在县委食堂吃饭时，隔着窗户瞧见了焦书记在食堂操作间面案上吃饭。

焦书记那时是中共兰考县委书记。他当时面对的是兰考连年风沙、盐碱、内涝的灾害，全县 36 万人生活难以为计，他肩上担子的重量是可想而知的。他又身患绝症，备受病痛的折磨。可是他仍然严格苛求自己。一顿早餐让我们感动，也深受教育。当时我便记下了那眼前的一幕。

几十年来，每当听到、看到党的一些干部贪腐的不良作风，公款吃喝一顿饭挥霍成千上万，我就要重写或修改一遍《焦书记的早餐》，算上这一稿已经是第四稿了，但是每一次都不敢出手，怕写不好，尤其是焦书记病逝，新华社记者穆青等采写的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在《人民日报》刊载以后，轰动全国。学习焦裕禄的热潮一浪高过一浪，各种媒体相继刊载，我这篇稿子便搁

置起来。

因为拖的时间太久了,年月日都记不清了。大约在1963年秋天,机关办公室收到了共青团兰考县委的工作报告,报告称:共青团兰考县委在中共兰考县委的领导下战风沙、治盐碱、排内涝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工作大有起色……

为此就派办公室的绍卿同志和我去兰考了解情况。而我还另有任务:《河南青年》编辑部还要我组织一组关于开展“如何修理地球”的讨论稿件。

那时候农村青年羡慕城市生活,大都不安于在家务农,有亲戚、朋友、老同学问起:“现在干什么工作?”回答往往是“修理地球”。这种回答是自嘲、是无奈,还是心理不平?大概都有吧。针对农村青年的这种心理状态,《河南青年》编辑部决定开展一次专题讨论,目的是使其认清形势,认清发展农业生产的重要性,激发农村青年学习生产知识技能的热情。

关于“如何修理地球”的讨论已经编发了好几期,农村青年对这个题目还很有兴趣。当时刊物的发行量猛增,由十几万份达到27万份。就连新疆的青年也参与讨论。

这次派我去兰考就是要组织兰考青年来讨论,听听兰考青年的心声。因为大家都知道兰考在我省是个穷县,是逃荒要饭出了名的地方,自从焦裕禄书记来到兰考以后,首先摘掉了“劝阻办”的牌子(“劝阻办”就是阻止群众外出逃荒要饭的部门),他不但阻止还送群众出去。后来还叫群众有组织地出去,但这不是逃荒要饭,而是凭劳动能力、生产技能讨生活:会烧窑的就去帮人家烧砖烧瓦;愿意下煤矿挖煤的就介绍你去挖煤;没技术的就上山砸石

子。这样不但解决了吃饭问题,也为国家创造了财富。愿意留下来的就治沙、治碱、治水除三害。青年的面貌变了,变被动地“修理地球”为主动地向这块土地要钱、要粮、要木材,想方设法修理好地球上这一小片地方,在艰苦的劳动中磨炼青年的意志。

到了兰考已是下午5点,和团县委的座谈只好安排在晚上进行。

座谈会上,团县委书记感慨地说:“去年正是我们遭受内涝、风沙、盐碱最严重的时刻,横贯全县境内的两条黄河故道是一眼望不到边的黄沙;有十万亩禾苗被碱死,白茫茫的盐碱地上满眼是枯草荒滩。广大青年不安于在家务农,怕穷怕苦结伴出去逃荒要饭……说实在的我的心也凉透了。那一天我正在写请调报告,焦书记来到团县委,要我们汇报青年团的工作,我摆了一大堆困难和存在的问题,畏难情绪很大。

“焦书记鼓励我们说:‘青年团是党的臂膀,是党的助手,你们的工作很重要啊!你们要赶快把团的工作抓起来。可是要把团员、青年这支队伍带好,团的干部可先要把劲儿提起来呀!’

“焦书记明明知道兰考是个穷县,困难重重,他偏偏来了;而我生长在这里,工作在这里,我却选择了逃避,相比之下我感到羞愧、脸红。听了焦书记的话,我把刚写了半截的请调报告撕碎扔到废纸篓里。第二天就背着行李到固阳公社蹲点去了。”

兰考团县委没有自己的招待所和客房,所以就把我们安排在县委招待所,招待所用餐的地方是在县委大食堂旁边另辟一间作为客人用餐,这间房和食堂的操作间隔窗相望。操作间有炉灶、有面案,还有一位大师傅。玻璃窗是开着的,操作间里的一举一动都

一目了然,说话也能听得清楚。

我们刚刚落座就看见操作间来了一位领导干部模样的人,这个人高高的个头,乌黑的头发,清癯的脸上有一双大眼睛。他披了一件深蓝色外衣,到了食堂操作间,便从墙壁上一个洞眼儿里拿出了一只粗白碗、一双筷子和调羹,他先在水池的水龙头下将碗筷冲洗一下,大师傅接了过去。

这位领导同志发现管伙的同志和团县委负责接待我们的同志两个人端菜端饭在食堂里忙活,便问:“有客人吗?是哪儿来的客人?”

团县委那位同志回答:“团省委的两位同志来调查青年团的工作情况,还要组织专题讨论。”

那位领导同志交代说:“你们要好好协助他们工作。”又说:“不管是上级来的还是外地来的,到了我们这里都是客,他们都是来帮助我们工作的。虽然我们兰考现在还很穷,也一定尽量让客人吃饱吃好。”

管伙的同志和团县委的同志点头称是。

我俩听了领导同志的一番话觉得很亲切。

不一会儿,在我们面前热腾腾的饭菜已摆满桌,有醋熘绿豆芽,白菜熬豆腐,香喷喷的葱花炒鸡蛋,金黄金黄、又香又酥的油条,也有白面馒头和绿豆稀饭。在那困难刚刚过去的年月,这顿早餐够丰盛的。

我们注意到,操作间里大师傅从一个陶罐里挖了两调羹芡粉放在那只粗白碗里,加上些温水调匀了,又去炉灶上提一壶开水冲入粗白碗里,随手挖一调羹红糖搅和几下放在领导同志面前。

“老张同志，客人的饭菜齐了？”

大师傅说：“都上齐了。”

过了好一会儿大师傅才说：“焦书记，你身体不好工作又累，见天早饭就这一碗红薯苕粉，俺心里……不得劲。”

“这就很不错了，又香又甜。”书记说。

绍卿同志小声对我说：“这位县领导就是焦裕禄焦书记啊，我刚才听见大师傅喊他焦书记。”

焦书记吃着吃着突然停了下来，只见他用筷子顶住肝部。大师傅见状连忙走过来问：“焦书记，汤是不是太热了，看你头上的汗直往下流……”

焦书记摇摇头没说话。

“是肝部又疼了吧？”大师傅关心地问。

他又说：“焦书记你啥都好，就是不听劝这一点不好。听人家说肝病需要高糖高蛋白，这一碗红薯苕粉能有多少营养？我说给你加个鸡蛋你不要，想去医院给你开点葡萄糖粉你不准。”

焦书记说：“老张师傅啊，你知道咱县受灾严重的大队的群众吃的什么吗？干粮是要饭要来的干馒头和杂面饼子，汤是清水煮干红薯叶。我的这碗红薯苕粉还有红糖，比起他们强多啦。”

看看焦书记的早餐，再看看我们餐桌上的饭菜；听听焦书记交代伙食管理员的话，也听见了焦书记和大师傅的对话，我们真是难为情。我看见绍卿同志两眼直勾勾地望着操作间，白面馒头在嘴里翻转。我们似乎是觉得不该吃这么好的早餐。

见到这种情形一下子联想到1959年冬天，总编派我去豫西一个偌大的工厂采访，在厂里巧遇我刚参加工作时的老领导，他那时

是这个厂的工会主席。中午老领导一定要带我去吃饭，我这才有机会见识了小灶食堂。

上午 11 点多，厂级领导陆陆续续来到饭堂，饭堂里窗明几净一尘不染，桌巾台布漂漂亮亮，杯盘碟碗都非常考究，我几乎不敢用手去触摸。

大师傅个个红光满面，笑脸相迎：“厂长，你的三鲜馅饺子来了！”大师傅将一盘热气腾腾的饺子摆放在厂长面前，后边年轻的炊工拿来了醋和剥好的蒜瓣。“书记你要的饽饽才下锅，羊肉臊子先来啦！”炊事员说着将一盛臊子的蓝花瓷碗放餐桌上。

另一位副厂长说：“阿拉的黄花鱼采购到了吗？”一个大师傅应道：“依的黄花鱼烧好啦。”一听就知道他是上海人，大师傅也是上海人。

“孙主席你要的土豆烧牛肉、西红柿鸡蛋汤好了。”

邻桌的一位厂领导看到了，他说：“孙主席，你今天有客人咋不要个好菜？”

我的老领导说：“土豆烧牛肉可是好东西，这可是赫鲁晓夫的共产主义呢。”

引发了哈哈一片笑声。

我见他们津津有味地吃着，就想啊，原来这就是小灶食堂，小到一人一灶；山西人爱吃饽饽，炊事员便给他一个人做饽饽；东北人爱吃饺子就得给他一个人包饺子；上海人有自己的炊事员。只有当地人酸浆面条大青豆是永远都吃不烦的。天天如此，月月如此，想吃什么就有什么，神仙般的生活。其实那个时候国家困难已露端倪，但在这里却显现不出一丁点儿迹象。